

# 财政支出、贸易开放与收入分配<sup>\*</sup>

胡文骏

**内容提要:**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工具,财政支出无法改变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初次收入分配不公,而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又将扭曲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1)整体上看,财政支出、贸易开放均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2)任何预算结构、支出类别的财政支出均无法显著影响贸易开放规模,这表明财政支出无法通过影响贸易开放规模来间接影响其收入分配效应;(3)贸易开放将显著抑制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规模,以及不同类别的财政总支出规模,这表明贸易开放能够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来间接影响其收入分配效应。因此,贸易开放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扭曲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不断优化财政支出收入分配调节能力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其有限性。

**关键词:**财政支出 贸易开放 收入分配 预算结构 支出类别

**作者简介:**胡文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博士研究生,361005。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7)12-0035-16

## 一、导 言

财政支出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通过提高支出效率、优化支出结构等形式来尽可能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Wolff和Zacharias,2007;丛树海,2012)。然而,即使财政支出能够“正向”调节收入分配不公,其调节能力也将受到来自贸易开放的挑战。具体而言:

一方面,贸易开放可能限制了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而无法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即要素收入分配环节)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边界:财政支出只能在初次收入分配不公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再分配来尽可能降低收入差距,而无法改变初次收入分配所造成的收入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逆向财政机制与收入差距”(71373220),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逆向财政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作者感谢杨斌、刘晔、谢贞发等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不平等(杨斌,2013)。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律在中国成立,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初次收入分配不公(李磊等,2011;Zakaria 和 Fida,2016)。因此,贸易开放将不可避免地扭曲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进而对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产生限制作用。

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可能扭曲了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理论研究和各国实践均表明,贸易开放将影响财政支出规模,但是具体影响方式存在争议:一派学者支持“效率假说”,认为贸易开放缩小了财政支出规模(Alesina 和 Perotti,1997;高翔、黄建忠,2016);另一派学者支持“补偿假说”,认为贸易开放扩大了财政支出规模(Rodrik,1998;高凌云、毛日昇,2011)。此外,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还很可能因时、因地、因要素禀赋差异而不同(毛捷等,2015;梅冬州、龚六堂,2012;Arawatari,2015)。不管“补偿假说”和“效率假说”哪一个成立,贸易开放都将显著影响财政支出规模,而这极有可能造成财政支出收入分配调节能力的扭曲。因此,贸易开放将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来扭曲其收入分配调节能力,且这一扭曲作用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

本文在充分考虑预算结构和支出类别的基础上,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和1998—2009年27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贸易开放以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论表明:贸易开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扭曲了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且中国的财政支出整体上扩大了收入差距,对收入分配产生了明显的逆向调节。因此,在使用财政支出作为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政策工具时,要充分认识到其收入分配调节能力的有限性。同时,还应尽一切可能,充分挖掘财政支出本应发挥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并尽量减轻贸易开放对其收入分配调节能力的扭曲作用。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1)提出了“贸易开放可能会限制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这一核心论点,分析并验证了财政支出收入分配调节能力的有限性,从而丰富了关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2)提出了“贸易开放可能会扭曲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这一核心论点,首次探讨了贸易开放因影响财政支出规模而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从而丰富了关于贸易开放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3)按照预算结构和支出类别的不同,将财政支出进行细致的划分,在确保统计口径合理、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探讨了不同预算结构、不同支出类别的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从而丰富了关于财政支出的相关研究。

## 二、文献综述

### (一)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的财政支出非但没能有效调节,甚至还扩大了收入差距。莫亚琳、张志超(2011)认为,在中国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框架下,财政支出的增加将会提高基尼系数、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陆铭和陈钊(2004)、雷根强和蔡翔(2012)认为,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导致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沈坤荣、张璟(2007)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公共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比过高,而农业科研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过低,这种支出结构限制了财政支出的收入调节能力。万海远等(2015)进一步发现,财政资金从乡镇到村庄、再到农户的纵向分配中,偏向于被富裕村庄和高收入农户获得,由此扩大了村庄间和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殷德生等(2015)的研究则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对中国各地区工薪差距变化具有非线性影响。

当然,也有学者对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持相对积极的观点。Wolff 和 Zacharias

(2007)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整体上缓解了收入不平等。Wu等(2006)认为,政府的福利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对农村部门的收入调节作用更加明显。李永友、沈坤荣(2007)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中国的相对贫困具有一定的贫困减缓作用。李增刚、韩相仪(2009)的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在短期内降低了中国的基尼系数。洪源等(2014)则进一步指出,民生财政支出的增长及其资金投向具有“农村倾向”特征,将会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丛树海(2012)认为,为了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应逐步减少经济建设支出,逐步控制和适度削减政府行政性开支,逐步增加民生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

### (二)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也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律成立,贸易开放将会扩大国内收入差距。Egger和Etzel(2012)发现,贸易开放将会扩大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Egger和Kreickemeier(2012)的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国内收入不平等将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而更加严重、更加多元。张莉等(2012)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导致要素收入向资本倾斜、劳动收入占比下降。Bergh和Nilsson(2010)、Foellmi和Oechslin(2010)、Zakaria和Fida(2016)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均得出了贸易自由化将会扩大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结论。

在以中国为样本的研究中,王云飞、朱钟棣(2009)的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会同时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报酬,但是资本报酬的提高幅度大于工资的提高幅度,由此将扩大收入差距。李磊等(2011)详细研究了贸易开放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对资本报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赵秋运、张建武(2013)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使得资本和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再分配,这导致我国资本密集型部门不断深化以及劳动密集型部门渐趋萎缩,最终使得我国总体劳动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张汉林、袁佳(2011)实证检验了加入WTO以来,贸易开放对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贸易全球化将会恶化中国的国内收入分配。韩军等(2015)的研究也表明,加入WTO拉大了中国城市高端和中端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此外,万广华等(2005)发现,对外贸易显著扩大了地区间收入差距。魏浩、赵春明(2012)的研究表明,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 (三)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

关于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学术界历来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支持效率假说,认为贸易开放增强了要素流动性,要素所有者可以通过威胁退出或退出的方式要求政府减少干预,因此政府将会降低税率、减少财政支出规模,用提高“效率”的形式吸引国际要素流入。Alesina和Perotti(1997)认为,贸易开放使得政府减轻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由此将带来市场效率的提升和财政支出规模的减小。胡兵等(2013)发现,贸易开放能够促进政府效率的改善,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规模的膨胀,会导致未来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调整。高翔、黄建忠(2016)的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对沿海地区政府规模的抑制作用要远大于内陆地区。

另一部分学者支持补偿假说,认为贸易开放将会带来更大的外部风险,由此将导致国内经济波动、失业等问题,因此政府将会提高财政支出规模,用以“补偿”贸易开放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个体。Rodrik(1998)发现,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一般都拥有较为庞大的政府支出规模。Ram(2009)利用150个国家4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对外贸易将会显著扩大政府规模。Jetter和Parmeter(2015)发现,贸易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倾向于拥有更大的政府规模。高凌云、毛日

昇(2011)发现,贸易开放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实际投资性支出、实际消费性支出和实际转移支付规模的提高。

此外,还有的学者持相对综合的观点。毛捷等(2015)发现,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历史时期将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机制。梅冬州、龚六堂(2012)的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国国内不同区域之间,贸易开放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Arawatari(2015)则认为,“补偿假说”和“效率假说”究竟哪一个成立取决于本国与贸易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

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和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第一,对贸易开放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关注不够。从文献来看,学者们在研究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时,一般都将贸易开放直接作为控制变量(陆铭、陈钊,2004;洪源等,2014),而未做进一步的处理。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观察到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收入分配调节能力的限制作用,但是却无法捕捉到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收入分配效应。此外,鉴于贸易开放将会显著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将贸易开放直接作为控制变量的处理方式极有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降低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第二,忽略了财政支出的预算结构问题。从文献来看,学者们在研究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时,普遍用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来代表财政支出(莫亚琳、张志超,2011;高凌云、毛日昇,2011)。然而,中国的财政支出由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4部分组成,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规模相对较大,不能直接忽略。<sup>①</sup>与此同时,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具备“专款专用”的特征,这与按照“基数加增长”为原则确定支出规模、具有一定“支出惯性”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具有很大的差别(胡文骏、刘晔,2016)。因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极有可能表现出与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如果不考虑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笼统地用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来代表财政支出的话,不仅无法反映财政支出的全貌,而且极有可能导致对财政支出收入分配调节能力的误判。

第三,对财政支出的功能分类不够精确,对统计口径的处理过于简单。从文献来看,学者们在研究不同类别的(公共)财政支出,以及(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时,一般都采用《中国财政年鉴》披露的按照类级科目进行划分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数据(雷根强、蔡翔,2012;洪源等,2014)。然而,在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改革之前,各部门的(公共)财政支出并没有集中统计在同一个类级支出科目中,而是分散统计在不同名称的类级支出科目中;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改革之后,各部门的(公共)财政支出才逐渐集中统计在同一个类级支出科目中(胡文骏、刘晔,2016)。<sup>②</sup>因此,想要研究不同类别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就必须对2007年以前的

<sup>①</sup> 根据历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披露的数据,地方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2年就已逼近10%,到2008年时已经突破20%。这表明,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结构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渐扩大,其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强。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立于2007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建立于2012年,二者的支出规模均很小,在分析中可以忽略不计。

<sup>②</sup> 以教育部门为例:2007年之前,教育部门用于教学楼、操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财政支出统计在“基本建设支出”(类级科目)当中,用于发放教职工工资福利、办公费用的(公共)财政支出统计在“教育经费”(类级科目)当中,而教育费附加支出则统计在“专项支出”(类级科目)当中;2007年之后,教育部门的所有(公共)财政支出均被统计在“教育支出”(类级科目)当中。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数据进行相应的分类调整,否则就难以反映部门财政支出的全貌,从而影响对不同类别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判。此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也可按照所属部门的不同进行分类,而目前尚未有文献关注这一问题。

综上,本文拟将财政支出和贸易开放放在同一个框架内,分析财政支出、贸易开放以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将在确保统计口径合理、一致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财政支出的预算结构和支出类别问题。

### 三、理论分析

本文首先借助一个引入财政支出和贸易开放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然后将财政支出和贸易开放放在同一个框架中,分析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而论证贸易开放将会限制、扭曲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

#### (一)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分析

借鉴 Barro(1990)的思路,参考胡兵等(2013)的做法,本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财政支出和贸易开放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Y = K^\alpha (AL)^\beta EX^\gamma TR^\theta$$

$$\dot{K} = sY - \delta K - EX$$

$$\dot{A} = gA, \dot{L} = nL$$

其中,Y表示总产出,K表示资本总投入,A表示技术水平,L表示劳动力总投入,EX表示政府财政总支出,TR表示对外贸易总额, $0 < \alpha, \beta, \gamma, \theta < 1$ 且 $\alpha + \beta + \gamma + \theta = 1$ ,s表示储蓄率,g表示技术进步率,n表示人口增长率, $\delta$ 表示资本折旧率。对上述模型进行人均化处理( $y = Y/AL, k = K/AL, ex = EX/AL, tr = TR/AL$ ),则有:

$$y = k^\alpha ex^\gamma tr^\theta$$

$$\dot{k} = s k^\alpha ex^\gamma tr^\theta - (n + g + \delta)k - ex$$

令 $\dot{k} = 0$ ,则有:

$$s k^\alpha ex^\gamma tr^\theta - (n + g + \delta)k - ex = 0$$

对等式两边求 tr 的导数,可得:

$$s\alpha k^{\alpha-1} ex^\gamma tr^\theta \frac{\partial k}{\partial tr} + s\gamma k^\alpha ex^{\gamma-1} tr^\theta \frac{\partial ex}{\partial tr} + s\theta k^\alpha ex^\gamma tr^{\theta-1} - (n + g + \delta) \frac{\partial k}{\partial tr} - \frac{\partial ex}{\partial tr} = 0$$

$$\text{令 } f(k, ex, tr) = \frac{(n + g + \delta) - s\alpha k^{\alpha-1} ex^\gamma tr^\theta}{s\gamma k^\alpha ex^{\gamma-1} tr^\theta - 1}, g(k, ex, tr) = \frac{s\theta k^\alpha ex^\gamma tr^{\theta-1}}{s\gamma k^\alpha ex^{\gamma-1} tr^\theta - 1}, \text{则有:}$$

$$\frac{\partial ex}{\partial tr} = f(k, ex, tr) \frac{\partial k}{\partial tr} - g(k, ex, tr)$$

从上式可知, $\partial ex / \partial tr$ 的符号取决于 $f(k, ex, tr)$ 、 $g(k, ex, tr)$ 和 $\partial k / \partial tr$ ,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

负。也就是说,贸易开放既可能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即“补偿假说”),又可能缩小财政支出规模(即“效率假说”)。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贸易开放将会显著影响财政支出规模,但是影响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二)财政支出和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假设一个开放经济体由 M、N 两个部门组成,部门 M 和部门 N 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m$  和  $n$ 。鉴于财政支出和贸易开放均会显著影响国民收入水平,且贸易开放将会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因此  $m$  和  $n$  可表示为贸易开放( $TR$ )和财政支出( $EX$ )的函数:

$$m(TR, \theta \cdot EX(TR)), n(TR, (1 - \theta) \cdot EX(TR))$$

其中,  $\theta$  表示部门 M 获取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1 - \theta)$  表示部门 N 获取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令  $incgap = m/n$ , 对等式两边求  $EX$  的导数, 即可得出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

$$\frac{\partial incgap}{\partial EX(TR)} = \frac{1}{n^2} [m_2 n \theta - m n_2 (1 - \theta)] \quad (1)$$

进一步, 对  $incgap = m/n$  等式两边求  $TR$  的导数, 即可得出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

$$\frac{\partial incgap}{\partial TR} = \frac{1}{n^2} (m_1 n - m n_1) + \frac{1}{n^2} [m_2 n \theta - m n_2 (1 - \theta)] \cdot \frac{\partial EX(TR)}{\partial TR} \quad (2)$$

将式(1)带入式(2), 可得:

$$\frac{\partial incgap}{\partial TR} = \frac{1}{n^2} (m_1 n - m n_1) + \frac{\partial incgap}{\partial EX(TR)} \cdot \frac{\partial EX(TR)}{\partial TR} \quad (3)$$

上式中, 等号右边第一项  $\frac{1}{n^2} (m_1 n - m n_1)$  表示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产生的直接影响, 等号右边第二项  $\frac{\partial incgap}{\partial EX(TR)} \cdot \frac{\partial EX(TR)}{\partial TR}$  表示贸易开放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规模而对收入分配产生的间接影响。

鉴于贸易开放主要在初次分配环节影响国民收入, 财政支出主要在再分配环节影响国民收入, 如果  $\frac{1}{n^2} (m_1 n - m n_1) > 0$ , 则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律成立, 贸易开放将恶化初次收入分配, 财政支出只能在此基础上通过优化再分配来尽可能降低收入差距, 这实际上是对财政支出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作用范围的一种限制。与此同时, 鉴于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 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收入调节能力的扭曲作用  $\left( \frac{\partial incgap}{\partial EX(TR)} \cdot \frac{\partial EX(TR)}{\partial TR} \right)$  也将表现出一定的难以预测性。在此情况下, 即使财政支出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其收入调节能力也将受到来自贸易开放的挑战。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 贸易开放会在初次收入分配环节直接影响收入分配, 这实际上限制了作为再分配政策工具的财政支出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影响范围。

假说 3: 贸易开放会在收入再分配环节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规模而间接影响收入分配, 这实质上是对财政支出收入调节能力的扭曲, 且这一扭曲作用的影响方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四、模型、指标与数据来源

##### (一) 实证模型

本文参考钞小静、沈坤荣(2014)的做法,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完备的结构式联立方程来分析财政支出、贸易开放以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联立方程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begin{cases} gini_{it} = \alpha_0 + \alpha_1 trade_{it} + \alpha_2 exp_{it-1} + \alpha_3 exp_{it-2} + \sum_{j=4}^{n1} \alpha_j X_{jit} + \mu_{Gi} + \epsilon_{Git} & (4) \\ trade_{it} = \beta_0 + \beta_1 exp_{it} + \beta_2 exp_{it-1} + \beta_3 exp_{it-2} + \sum_{j=4}^{n2} \beta_j Y_{jit} + \mu_{Ti} + \epsilon_{Tit} & (5) \\ exp_{it} = \gamma_0 + \gamma_1 trade_{it} + \gamma_2 exp_{it-1} + \gamma_3 exp_{it-2} + \sum_{j=4}^{n3} \gamma_j Z_{jit} + \mu_{Ei} + \epsilon_{Eit} & (6) \end{cases}$$

本文建立的联立方程模型包括3个基本方程,其中 *gini* 代表收入分配, *trade* 代表贸易开放, *exp* 代表财政支出规模, *X*、*Y*、*Z* 是对应方程的控制变量集合,  $\mu_{Gi}$ 、 $\mu_{Ti}$ 、 $\mu_{Ei}$  为个体效应,  $\epsilon_{Gi}$ 、 $\epsilon_{Ti}$ 、 $\epsilon_{Ei}$  为随机扰动项。具体而言:方程(4)为收入分配方程,主要研究财政支出、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本文的主方程。鉴于财政支出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这些公共服务并不直接影响当期的收入分配,但会对未来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因此在收入分配方程中,本文选用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财政支出规模作为当期收入分配的核心解释变量。方程(5)为贸易开放方程,主要研究财政支出规模对贸易总量的影响,是本文的辅助方程。方程(6)为财政支出方程,主要研究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也是本文的辅助方程。

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所有外生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选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在3SLS的处理模式下,联立方程组中等式右边的所有内生变量均通过工具变量进行参数估计,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在联立方程组中,  $\alpha_1$  表示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  $\alpha_2$ 、 $\alpha_3$  表示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  $\beta_1$ 、 $\beta_2$ 、 $\beta_3$  表示财政支出对贸易开放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gamma_1$  表示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1)如果  $\alpha_1$ 、 $\alpha_2$ 、 $\alpha_3$  显著,同时  $\beta_1$ 、 $\beta_2$ 、 $\beta_3$  不显著,这意味着贸易开放和财政支出均能影响收入分配,但是财政支出无法影响贸易开放规模。这表明,财政支出不仅无法显著影响初次收入分配,而且无法显著影响贸易开放这一造成初次收入分配扭曲的关键因素。此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出“贸易开放限制了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这一结论。(2)如果  $\gamma_1$  显著,同时  $\alpha_2$  或  $\alpha_3$  也显著,这意味着贸易开放能影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能影响收入分配。这表明,贸易开放将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来间接影响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此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出“贸易开放扭曲了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这一结论。

##### (二) 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gini* 代表收入分配的整体情况,用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表示,具体算法和数据来源详见田卫民(2012); *trade* 代表贸易开放程度,用(进口额+出口额)/GDP来表示,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p* 代表财政支出规模,用财政总支出/GDP来表示,财政总支出=公共财政预算总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X* 为收入分配方程的控制变量集合,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陆铭、陈钊,2004;李磊等,2011),

此处控制了产业结构(*estru*)、城镇化率(*urb*)、资本开放程度(*capit*)、经济发展程度(*pergdp*)、所有制结构(*private*)和财政分权(*fd*),以及加入 WTO 虚拟变量(*D2001*)、所得税分享机制改革虚拟变量(*D2002*);*Y* 为贸易开放方程的控制变量集合,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许雄奇等,2006;顾国达、麻晔,2015),此处控制了国内储蓄投资比(*S/I*)、金融发展程度(*finance*)、人口年龄结构(*astru*)、地方人口规模(*psize*)、城镇化率(*urb*)、资本开放程度(*capit*)、经济发展程度(*pergdp*)、所有制结构(*private*)和财政分权(*fd*),以及加入 WTO 虚拟变量(*D2001*)、所得税分享机制改革虚拟变量(*D2002*);*Z* 为财政支出方程的控制变量集合,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高凌云、毛日昇,2011;毛捷等,2015),此处控制了产业结构(*estru*)、人口年龄结构(*astru*)、地方人口规模(*psize*)、城镇化率(*urb*)、资本开放程度(*capit*)、经济发展程度(*pergdp*)、所有制结构(*private*)和财政分权(*fd*),以及加入 WTO 虚拟变量(*D2001*)、所得税分享机制改革虚拟变量(*D2002*)。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根据联立方程模型的识别条件,本文建立的联立方程模型是过度识别的。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吉林、山东、海南、西藏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无法计算,本文只能获得 27 个省级单位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同时,由于 2010 年以来的《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无法获取,本文数据分析的时间长度只能确定为 1998—2009 年。基于此,本文使用 1998—2009 年 27 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型所涉及的各个变量的具体计算方法详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i>gini</i>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田卫民(2012)
<i>trade</i>	贸易开放程度	(进口额+出口额)/GDP
<i>exp</i>	财政支出规模	(公共财政预算总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GDP
<i>estru</i>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i>S/I</i>	国内储蓄投资比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i>finance</i>	金融发展程度	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
<i>astru</i>	人口年龄结构	14 岁以下、65 岁以上人口的总抚养比
<i>psize</i>	地区人口规模	地区总人口/地区总面积
<i>urb</i>	城镇化率	非农业人口/总人口
<i>capit</i>	资本开放程度	FDI/GDP
<i>pergdp</i>	经济发展程度	人均 GDP 增长率
<i>private</i>	所有制结构	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i>fd</i>	财政分权	地方政府实际入库的税收收入/地方政府总税收收入
<i>D2001</i>	加入 WTO 虚拟变量	在 1998—2000 年取 0,在 2001—2009 年取 1。
<i>D2002</i>	所得税分享机制改革虚拟变量	在 1998—2001 年取 0,在 2002—2009 年取 1。

## 五、实证检验

本文选用 3SLS 方法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从实证结果来看,在收入分配方程中,*trade* 的系数为 0.134、显著为正,*exp*(-1)的系数为 0.166、显著为正,这表明贸易



开放将会显著恶化国内收入分配,而中国的财政支出扩大了收入差距、对收入分配产生了“逆向调节”。在贸易开放方程中, $exp$ 、 $exp(-1)$ 和 $exp(-2)$ 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并未对贸易开放程度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财政支出无法通过影响贸易开放的规模来改变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因此,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收入调节能力的限制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在财政支出方程中, $trade$ 的系数为 $-0.131$ 、显著为负,这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将会显著抑制财政支出规模,“效率假说”成立。因此,贸易开放将通过抑制财政支出规模来降低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当财政支出逆向调节收入分配时,“效率假说”的成立使得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不公的逆向调节作用。但是,如果政府通过提高支出效率、优化支出结构等途径使得财政支出能够正向调节收入分配不公,那么在“效率假说”的影响下,贸易开放又将反过来限制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正向调节能力。因此,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收入调节能力的扭曲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总的来看,上述回归结果与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基本一致,贸易开放限制、扭曲了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

表 2 实证结果

变量	gini	trade	exp
$trade$	0.134*** (0.0415)		-0.131* (0.0718)
$exp$		2.862 (3.195)	
$exp(-1)$	0.166** (0.0678)	-3.407 (3.215)	0.939*** (0.0956)
$exp(-2)$	-0.0922 (0.0656)	0.959 (0.839)	-0.214** (0.08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0	270	270
R <sup>2</sup>	0.925	0.959	0.935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本文分别用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ugini$ )、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rgini$ )、城乡收入比( $urgap$ )代替主回归中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gini$ ),重新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 3SLS 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sup>①</sup> 总的来看,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主回归基本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核心论点。<sup>②</sup>

① 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ugini$ 、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rgini$  的数据来源于田卫民(2012),城乡收入比  $urgap$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② 此外,本文还参考毛捷等(2015)的做法,用  $trade02 = (\text{进口额} + \text{出口额}) / (\text{GDP} - \text{第三产业增加值})$  代替  $trade$  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回归结果与主回归基本一致,各核心变量的作用方向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理论分析部分的判断。限于篇幅,这里并未报告详细的实证结果。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ugini 方程组			rgini 方程组			urgap 方程组		
	ugini	trade	exp	rgini	trade	exp	urgap	trade	exp
trade	0.106** (0.0500)		-0.124* (0.0751)	0.371*** (0.0975)		-0.176*** (0.0670)	0.708** (0.349)		-0.163** (0.0723)
exp		3.030 (3.238)			3.669 (3.168)			3.407 (3.214)	
exp(-1)	0.180** (0.0837)	-3.663 (3.250)	0.937*** (0.0974)	0.477*** (0.160)	-4.149 (3.187)	0.898*** (0.102)	0.982* (0.583)	-4.173 (3.225)	0.886*** (0.0952)
exp(-2)	-0.0335 (0.0902)	0.950 (0.850)	-0.220*** (0.0843)	-0.0244 (0.161)	1.129 (0.832)	-0.206* (0.105)	0.234 (0.629)	1.055 (0.0844)	-0.213** (0.08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R <sup>2</sup>	0.637	0.958	0.937	0.196	0.954	0.915	0.952	0.955	0.921

## 六、基于预算结构和支出类别的进一步检验

### (一) 基于预算结构的进一步检验

从支出规模的确定、资金使用方式等方面来看,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有着明显不同(胡文骏、刘晔,2016),因此有必要分别进行分析。此外,从财政支出的经济分类<sup>①</sup>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被用于财政供养人口的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费用的发放,因此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员经费预算支出”的规模。基于此,本文将沿用上述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框架,分别分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pexp$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fexp$ )和财政供养人口( $fisdep$ )的收入分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sup>②</sup>

在  $pexp$  方程组中,收入分配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136、显著为正,  $pexp(-1)$  的系数为 0.218、显著为正,贸易开放方程的  $pexp$ 、 $pexp(-1)$  和  $pexp(-2)$  的系数均不显著,财政支出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135、显著为负。在  $fexp$  方程组中,收入分配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155、显著为正,  $fexp(-1)$  的系数为 0.292、显著为正,贸易开放方程的  $fexp$ 、 $fexp(-1)$  和  $fexp(-2)$  的系数均不显著,财政支出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不显著。在  $fisdep$  方程组中,收入分配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117、显著为正,  $fisdep(-1)$  和  $fisdep(-2)$  的系数均不显著,贸易开放方程的  $fisdep$ 、 $fisdep(-1)$  和  $fisdep(-2)$  的系数均不显著,财政支出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也不显著。

<sup>①</sup> 财政支出的经济分类是按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所做的一种分类,我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具体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转移性支出、赠予、债务利息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贷款转贷及产权参股和其他支出等 12 类。

<sup>②</sup>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pexp$  =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GDP,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fexp$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GDP,财政供养人口 = 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供养人口/非农业人口。

表 4 基于预算结构的进一步检验

变量	<i>pexp</i> 方程组			<i>fexp</i> 方程组			<i>fisdep</i> 方程组		
	<i>gini</i>	<i>trade</i>	<i>pexp</i>	<i>gini</i>	<i>trade</i>	<i>fexp</i>	<i>gini</i>	<i>trade</i>	<i>fisdep</i>
<i>trade</i>	0.136*** (0.0378)		-0.135** (0.0565)	0.155*** (0.0483)		-0.0332 (0.0374)	0.117*** (0.0404)		0.00614 (0.0185)
<i>pexp</i>		2.358 (3.128)							
<i>pexp</i> (-1)	0.218*** (0.0716)	-2.768 (3.216)	0.995*** (0.0849)						
<i>pexp</i> (-2)	-0.109 (0.0777)	0.875 (0.895)	-0.236*** (0.0873)						
<i>fexp</i>					35.08 (35.05)				
<i>fexp</i> (-1)				0.292* (0.163)	-29.41 (27.51)	0.720*** (0.104)			
<i>fexp</i> (-2)				0.209 (0.179)	3.472 (4.364)	-0.141* (0.0822)			
<i>fisdep</i>								4.394 (17.76)	
<i>fisdep</i> (-1)							-0.177 (0.193)	0.441 (8.096)	0.440*** (0.0800)
<i>fisdep</i> (-2)							-0.00730 (0.106)	-1.347 (0.836)	0.0368 (0.044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R <sup>2</sup>	0.917	0.963	0.932	0.913	0.699	0.812	0.927	0.965	0.981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1)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均显著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这表明财政支出逆向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特征非常明显;(2)贸易开放将显著抑制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规模,但是不会显著影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规模,这表明贸易开放将会扭曲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而不会扭曲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3)财政供养人口所代表的“人员经费预算支出”规模膨胀不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显著影响,贸易开放也不会显著影响财政供养人口的规模,这表明政府人员经费规模的膨胀不会对国民收入分配产生显著影响,且贸易开放不会影响政府在人员经费划拨方面的决策;(4)不同预算结构的财政支出均无法显著影响贸易开放的规模,这进一步说明财政支出无法改变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二)基于支出类别的进一步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将财政支出(包含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划分为工商部门、农业部门、民生部门和其他部门4个类别。<sup>①</sup>关于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本文利用历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细化到款级科目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数据,按照相同的统计口径,将地方公共财政总支出归集为上述4个类别;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本文按照相同的统计口径,将历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总支出也归集为上述4个类别。基于此,本文将继续沿用上述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框架,分别分析工商部门财政支出(*exp01*)、农业部门财政支出(*exp02*)、民生部门财政支出(*exp03*)、其他部门财政支出(*exp04*)的收入分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表6所示。<sup>②</sup>

表5 基于支出类别的进一步检验(1)

变量	<i>exp01</i> 方程组			<i>exp02</i> 方程组		
	<i>gini</i>	<i>trade</i>	<i>exp01</i>	<i>gini</i>	<i>trade</i>	<i>exp02</i>
<i>trade</i>	0.123*** (0.0360)		-0.0488* (0.0253)	0.131*** (0.0384)		-0.0328** (0.0139)
<i>exp01</i>		-20.41 (128.7)				
<i>exp01</i> (-1)	0.184 (0.135)	10.67 (67.68)	0.528*** (0.0727)			
<i>exp01</i> (-2)	-0.309** (0.134)	-0.924 (11.35)	-0.0416 (0.0733)			
<i>exp02</i>					7.152 (7.215)	
<i>exp02</i> (-1)				0.495** (0.247)	-5.807 (4.440)	0.482*** (0.0846)
<i>exp02</i> (-2)				0.0559 (0.240)	-1.176 (1.485)	-0.0551 (0.08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R <sup>2</sup>	0.931	0.900	0.789	0.926	0.963	0.863

在*exp01*方程组中,收入分配方程的*trade*的系数为0.123、显著为正,*exp01*(-2)的系数为-0.309、显著为负,贸易开放方程的*exp01*、*exp01*(-1)和*exp01*(-2)的系数均不显著,财政支出方程的*trade*的系数为-0.0488、显著为负。在*exp02*方程组中,收入分配方程的*trade*的系数为

① 具体而言,工商部门包括工业部门、交通部门、商贸部门、流通部门、建设部门、邮电部门、国有资产部门、旅游部门、地质部门、能源部门,农业部门包括农业部门、林业部门、水利部门、气象部门,民生部门包括教育部门、科学部门、卫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文化部门、体育部门、传媒部门、计生部门,其他部门包括所有未被列入工商部门、农业部门、民生部门的部门(如国防部门、外交部门、武警部门、公检法司部门等)。

② 具体而言,某部门财政支出=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当中的某部门财政支出/GDP。

0.131、显著为正,  $exp02(-1)$  的系数为 0.495、显著为正, 贸易开放方程的  $exp02$ 、 $exp02(-1)$  和  $exp02(-2)$  的系数均不显著, 财政支出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0328$ 、显著为负。在  $exp03$  方程组中, 收入分配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125、显著为正,  $exp03(-1)$  的系数为 0.236、显著为正, 贸易开放方程的  $exp03$ 、 $exp03(-1)$  和  $exp03(-2)$  的系数均不显著, 财政支出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0553$ 、显著为负。在  $exp04$  方程组中, 收入分配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135、显著为正,  $exp04(-1)$ 、 $exp04(-2)$  的系数均不显著, 贸易开放方程的  $exp02$ 、 $exp02(-1)$  和  $exp02(-2)$  的系数均不显著, 财政支出方程的  $trade$  的系数为  $-0.111$ 、显著为负。

表 6 基于支出类别的进一步检验(2)

变量	$exp03$ 方程组			$exp04$ 方程组		
	$gini$	$trade$	$exp03$	$gini$	$trade$	$exp04$
$trade$	0.125*** (0.0378)		$-0.0553^*$ (0.0293)	0.135*** (0.0421)		$-0.111^{**}$ (0.0470)
$exp03$		5.205 (6.350)				
$exp03(-1)$	0.236* (0.129)	$-5.005$ (5.273)	0.791*** (0.0801)			
$exp03(-2)$	$-0.0321$ (0.126)	1.526 (1.488)	$-0.173^{**}$ (0.0755)			
$exp04$					15.50 (14.15)	
$exp04(-1)$				0.201 (0.154)	$-15.55$ (13.14)	0.773*** (0.136)
$exp04(-2)$				0.134 (0.182)	2.712 (3.333)	$-0.333^{**}$ (0.1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R^2$	0.929	0.962	0.916	0.924	0.931	0.709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1)工商部门财政支出将显著缩小国内收入差距,这可能是因为该类财政支出促进了工商业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表现为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正向调节;(2)农业部门财政支出将显著扩大国内收入差距,这可能是因为该类财政支出在资金分配时更容易被农村高收入群体获取(万海远等,2015),进而表现为对收入分配不公的逆向调节;(3)民生部门财政支出将显著扩大国内收入差距,这可能是因为该类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陆铭、陈钊,2004;雷根强、蔡翔,2012),进而表现为对收入分配不公的逆向调节;(4)其他部门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并无显著影响,这表明旨在提供纯公共品(如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的财政资金不会表现出明显的收入分配效应;(5)贸易开放将显著抑制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规模,这表明贸易

开放将会扭曲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6)不同支出类别的财政支出均无法显著影响贸易开放的规模，这进一步说明财政支出无法改变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1998—2009 年 27 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在联立方程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财政支出、贸易开放以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国财政支出的特征，按照预算结构的不同，本文将财政总支出划分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 个部分；按照支出类别的不同，本文财政总支出进一步划分为工商部门财政支出、农业部门财政支出、民生部门财政支出、其他部门财政支出 4 个类别。实证结果表明：(1)贸易开放将会明显恶化国内收入分配，而且任何预算结构、支出类别的财政支出均无法显著影响贸易开放，这表明财政支出无法通过影响贸易开放程度来改变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2)“效率假说”在中国整体成立，贸易开放抑制了不同预算结构、不同支出类别的财政支出规模，这表明贸易开放能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来间接影响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3)中国的财政支出整体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这一逆向调节作用主要来源于本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农业部门财政支出、民生部门财政支出。

综上所述，在中国，贸易开放的确限制、扭曲了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同时，财政支出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表现出了逆向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财政支出收入分配调节能力的有限性。从实证结果来看，在经济开放条件下，贸易开放将不可避免地限制、扭曲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因此，在选择财政支出作为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政策工具时，要充分认识到其影响边界。财政支出只能作为“一揽子”政策工具当中的一种，其作用绝对不是万能的。

第二，要充分挖掘财政支出本应发挥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从支出类别来看，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不公的逆向调节作用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和民生部门，这表明上述两个类别的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不公应该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应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转变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大力推进精准扶贫，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途径，充分挖掘农业部门、民生部门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使其在未来真正成为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政策工具。

第三，要尽量减轻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收入调节能力的扭曲作用。当“效率假说”成立时，财政支出即使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不公，其调节能力也会受到来自贸易开放的扭曲。因此，在提高财政支出收入调节能力的同时，还应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鼓励地方政府使用降低税率、减少财政支出以外的方式来吸引生产要素流入，从而尽可能减轻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抑制作用，进而减小财政支出收入调节能力所可能遭受的扭曲。

### 参考文献：

1. 钞小静、沈坤荣：《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4 年第 6 期。
2. 丛树海：《基于调整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府收支研究》，《财贸经济》2012 年第 6 期。

3. 高凌云、毛日昇:《贸易开放、引致性就业调整与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支出规模变动》,《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4. 高翔、黄建忠:《贸易开放、要素禀赋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1997—2013》,《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5期。
5. 顾国达、麻晔:《财政支出偏向、金融约束与中国外贸失衡》,《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11期。
6. 韩军、刘润娟、张俊森:《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南方谈话”和“入世”后效果的实证检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7. 洪源、杨司键、秦玉奇:《民生财政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
8. 胡兵、陈少林、乔晶:《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8期。
9. 胡文骏、刘晔:《财政分权、预算结构与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基于款级科目的数据调整分析》,《当代财经》2016年第5期。
10. 雷根强、蔡翔:《初次分配扭曲、财政支出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
11. 李磊、刘斌、胡博、谢璐:《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收入及分配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
12. 李永友、沈坤荣:《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13. 李增刚、韩相仪:《教育财政支出对基尼系数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财贸经济》2009年第8期。
14.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15. 毛捷、管汉晖、林贤智:《经济开放与政府规模——来自历史的新发现(1850—2009)》,《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16. 梅冬冬、龚六堂:《开放真的导致政府规模扩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期。
17. 莫亚琳、张志超:《城市化进程、公共财政支出与社会收入分配——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与面板数据计量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18. 沈坤荣、张璟:《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19. 田卫民:《省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经济科学》2012年第2期。
20. 万广华、陆铭、陈钊:《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1. 万海远、田志磊、徐琰超:《中国农村财政与村庄收入分配》,《管理世界》2015年第11期。
22. 王云飞、朱钟棣:《贸易发展、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基于特定要素的短期分析》,《世界经济》2009年第1期。
23. 魏浩、赵春明:《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2年第1期。
24. 许雄奇、张宗益、康继军:《财政赤字与贸易收支不平衡:来自中国经济的经验证据(1978—2003)》,《世界经济》2006年第2期。
25. 杨斌:《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纠正: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是税收调节——兼论改变经济全球化中生产要素流动的非对称性对纠正收入分配的作用》,《税务研究》2013年第1期。
26. 殷德生、唐海燕、王奕黎:《技能积累、财政政策与工薪差距》,《世界经济》2015年第10期。
27. 张汉林、袁佳:《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分析——对中国入世10周年的总结与反思》,《财贸经济》2011年第11期。
28.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2期。
29. 赵秋运、张建武:《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驱动机制新解——基于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的视角》,《金融研究》2013年第12期。
30. Alesina, A. & Perotti, R., The Welfare State and Competitive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5, 1997, pp. 921—939.
31. Arawatari, R.,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Openness and Government Size.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27, No. 1, 2015, pp. 28—52.
32.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1990, pp. 103—125.
33. Bergh, A. & Nilsson, T., Do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crease Income Inequ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6, No. 4, 2010, pp. 488—505.
34. Egger, H. & Etzel, D., The Impact of Trade on Employment, Welfa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nionized General

Oligopolistic Equilibrium.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6, No. 6, 2012, pp. 1119–1135.

35. Egger, H. & Kreckemeier, U., Fairness, Trade, and Inequ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6, No. 2, 2012, pp. 184–196.

36. Foellmi, R. & Oechslin, M., Market Imperfections, Wealth Inequa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rade Gai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1, No. 1, 2010, pp. 15–25.

37. Jetter, M. & Parmeter, C. F., Trade Openness and Bigger Governments: The Role of Country Size Revisite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7, 2015, pp. 49–63.

38. Ram R., Openness, Country Size, and Government Size: 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A Large Cross-Country Pan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3, No. 1, 2009, pp. 213–218.

39. Rodrik, D.,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6, No. 5, 1998, pp. 997–1032.

40. Wolff, E. N. & Zacharias, A., The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U. S., 1989 and 2000. *Review and Income and Wealth*, Vol. 53, No. 4, 2007, pp. 53–62.

41. Wu, X., Perloff, J. M. & Golan, A., Effe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Urban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52, No. 2, 2006, pp. 213–235.

42. Zakaria, M. & Fida, B. A., Trade Opennes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the SAARC Region.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0, No. 2, 2016, pp. 33–44.

## Fiscal Expenditure, Trade Opennes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HU Wenjun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361005)

**Abstract:** As a policy tool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fiscal expenditure cannot change the unfair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caused by trade openness. Moreover, trade openness will affect the scale of fiscal expenditure and even its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1) fiscal expenditure extends income gap on the whole, and trade openness worsens income distribution overall; (2) whatever budget structure and expenditure category, fiscal expenditure cannot affect the scale of trade openness, which means that fiscal expenditure cannot transform trade openness'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3) trade openness can reduce the scale of 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 and most categories' fiscal expenditure, which means that trade openness can transform fiscal expenditure's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 Therefore, trade openness will limit and distort fiscal expenditure's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 We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e finiteness of fiscal expenditure's ability to adjust the unfair of income distribution.

**Keywords:** Fiscal Expenditure, Trade Openness, Income Distribution, Budget Structure, Expenditure Category

**JEL:** F14, H50

责任编辑:原 宏